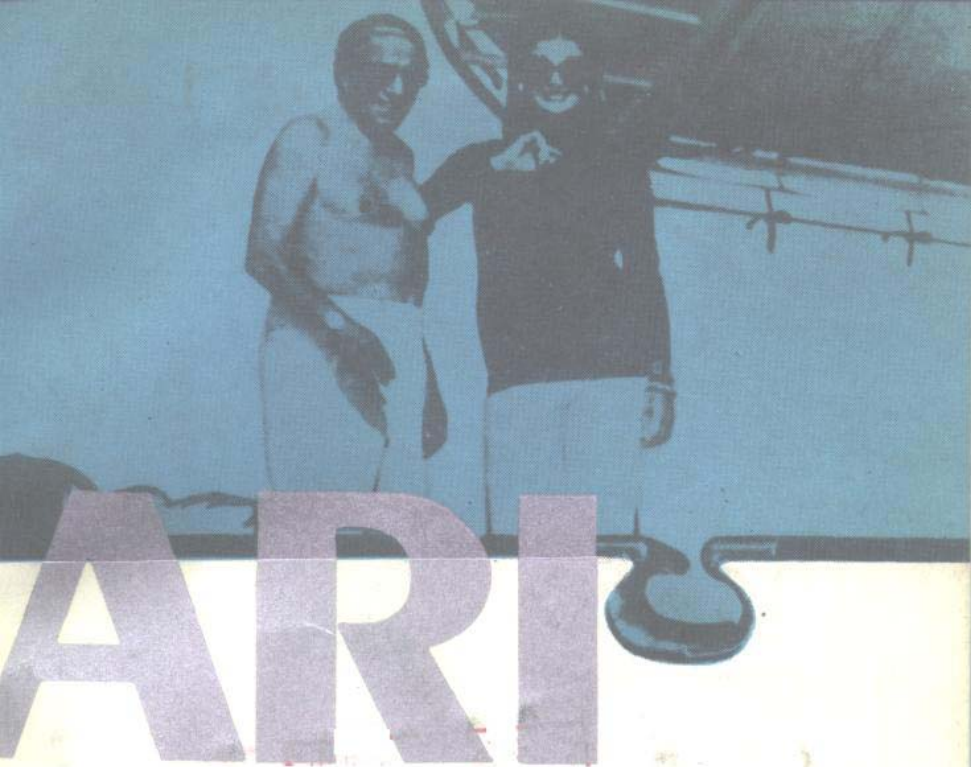




希腊船王

阿里传

〔美〕彼德·伊文思 著
黎修 章华 郑强 方正 译

希腊船王阿里传

〔美〕彼德·伊文思 著

黎修 章华 郑强 方正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ARI
*The Life and Times
of
Aristotle Onassis*
by
PETER EVANS
Summit Books, New York,
1986

希腊船王阿里传

〔美〕彼德·伊文思 著
黎修 章华 译
郑强 方正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3.25印张 2插页 282千字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8500册

*

ISBN7-5059-0479-5/I·304 定价：3.30元

DJS1/33 C(

前言

一九六八年一月的一个夜晚十一点刚过不多会儿，我在伦敦自己的家里接到一个美国人的电话，对方自我介绍为翰·迈耶；他邀请我飞到巴黎去会见阿里士多德·奥克斯。他说：“我们希望尽早地面谈。”至于谈什么，他不准备在电话里说明，但是他说我一定会感兴趣——并且对我有好处。尽早，看来就是次日早晨了。在希里罗机场法航的柜台上已经有一张为我预订的机票在等着我；迈耶将在奥尔利机场接我；我到那里去要作好过夜的准备；他已经在巴黎雅典大厦定了房间。我放下听筒，给航空公司打了电话：说是确已有一张用我的名字预定的头等舱机票。第二天十二点在福熙街八十八号我第一次见到了阿里。他跟我所想象的大致差不多。一个强壮的小个子六十多岁，有一张表情丰富的脸，黑头发中有缕缕的灰色而且已经开始脱发了。他的嗓音是用心调节了的，略为粗糙，这是一天抽六十支烟和嗜威士忌酒的人所难免的。他说话带着一个久别家乡的游子渴望回归的多音。我猜想他在女人面前一定善于使用这种口音。他的眼睛藏在他常戴的黑眼镜后面，不过我知道这双眼睛是敏锐的、沉思的又是幽默的。他穿了一套款式保守的蓝色套装，在上面的衣兜里插了块绣着他名字图案的白绸手帕。只有他的手出于我的意料。看上去又黑又硬，一接触却柔软如

少女的手。他让我坐在他的路易十五书桌对面的椅子上。他的肖像挂在他背后的墙上；他的儿女的照片，装在银制的像框里，并排放在他的书桌上。克里斯蒂娜的面貌和他十分相象；亚历山大看上去很严肃而且聪明。他们不象幸福的儿童。

他在考虑“制作一本书”，关于他的一生的一本书。阿里立即话入正题。他不能确定该写自传还是经他本人核准的传记，但不论是那一种，他要一本“百分之百与实际发生的事相一致的”书。他问我对写这么一本书有没有兴趣。据我所知那一年晚些时候要出版一本据说是他同意了的，即使是没有他的合作的传记。我问他还要另外一本书干什么？“我不满足于只有一条船，埃文斯先生，为什么我就该满足于一本书呢？”他答道。我说，我无意于给他写一本理想化的传记，我要求他把他设想的书说得很明确。他开始告诉我他的早年生活，他在土麦那（现名伊兹密尔）度过的童年，一九二二年的大屠杀，他逃亡到阿根廷，在那里初次置了家当。过了几分钟，他停下来，摘下黑眼镜，用绸手帕缓慢地擦拭眼镜的玻璃。我第一次看见他的眼睛，是古铜色的。“我想这本书谈起来要象一本小说一样，”他说着，把眼镜重新戴上。“你可是有着一部出色的故事，阿里。英雄的传奇，”一直静静地坐在窗边的迈耶说。阿里说：“啊，我们还可以写成一本他娘的冒险小说。”这时我说了一句话：大概他把自己当作了英雄。他本可以为了这句话生气，但是他没有，而且他还说：“不——是坏蛋。反派角色演起来总是最好。”我想，这倒是个好开端。但是我依然想知道为什么他要我来写这本书。我们从来不曾见过面，而且据我所知，我们也没有共同的朋友可以向他提出我们名字。我说了这

种情况，他从桌子上拿起一封信交给我。信是阿里写给让·保罗·格蒂的。信上说他，阿里，正在考虑写他的生平故事，请格蒂提出一个合适的作家来一起为这个计划工作。格蒂把阿里的信寄回来，在边缘空白处把我的名字和电话号码都写上了。（我当时正在为《世界主义者》杂志采访格蒂，已经在伦敦和在萨里他的庄园“苏东庐”里同他呆了好几天，他不是那种愿意为与他本人利益无关的事浪费时间的人，我猜想我的名字是他最容易想起来的一个。）

我们在马克西姆餐厅就餐。阿里喝着黑牌（高级）苏格兰威士忌和佩里尼翁香槟酒，他是主要的讲话者，不过约翰·迈耶也不怕偶尔插入一两句话。有一次提到玛丽亚·卡拉斯的的名字，迈耶说：“玛丽亚以前老是把你看成一位希腊神，阿里，现在她只把你看成一个混帐的希腊人。”阿里听了大笑，笑声毫不做作。喉音重浊；迈耶知道他同阿里开玩笑能开到什么程度。（他们的友谊始于战争年代的华盛顿，这是在从飞机场出来的路上，在豪华的汽车里迈耶告诉我的；他说 he 自己是阿里的副官。）这次午餐是一次很长的午餐。我问了我想问的问题，阿里也不试图避讳什么。我解释，如果要写书，我需要得到一些什么样的有关个人的细节以及我要谈话的人，对此他也处之泰然。他说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一个人的生活要是没有人详加考察过是不值得活的。”（后来我发现这句话出自苏格拉底；阿里的游艇“克里斯蒂娜”号上的书房里，满是希腊古典作品。）在喝过柯纳克白兰地之后，他说：“那么到现在为止，你看我是怎样一个人呢，埃文斯先生？”我说，我以为他有风格。

“风格，也许有，但是他们说我并不优雅高贵。幸好，那些

优雅高贵者通常愿意忽略这个缺点，因为我非常有钱。你出钱买不到优雅，但是可以买到对缺少优雅者的宽容。”我有个印象，他为这次会见作了准备，我看到的是一次表演，不过我确信如果他下了决心，他可以使任何人相信任何事情。不管怎样，神秘、金钱和性的结合，还包含着可能写出极其出色的故事，这一切是有吸引力的。这样，那天下午我们在走出餐厅以前就达成了协议。

我们开始了一系列的谈话。我用谈话而不用访问是因为我很快地就发现他对正规的问答方式反应不好，他的脑子不是按逻辑的模式思考的。如果他猜疑我在谈话以前曾对我想写的他过去的某一事件或某一插曲作过研究，他就会恼怒。

“这是那些累得要死的记者自己不会动脑筋时的做法，”他说，不过我了解，这是他控制情况的一种方法。他在随便交往时表现最好，想起很多往事，进行自我分析——尤其是在吃饭，在酒吧喝酒，在伦敦或巴黎的街上深夜散步时最好。他象一切能使听众入迷的人一样，喜欢有人听他讲；在巴黎，有时候约翰·迈耶就得跟着听，他还常带着一个克劳德夫人沙龙的姑娘或是疯马沙龙的歌舞女郎；偶而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也参加进来，不过他听到阿里的一些故事觉得不舒服，特别是他不知道那件事以后会引出什么事来，或是他从未听过的，不知又要发现他父亲的什么新情况。他们的关系并不融洽。最能使阿里鼓舞的是康斯坦丁（简称科斯塔）·格拉乔斯，他的最亲密的老朋友。他们是二十年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首次认识的，格拉乔斯比任何人更知道阿里的希望，他的思想和他的罪孽。“科斯塔知道我犯的一切罪过，”阿里是这样把他介绍给我的。格拉乔斯知道阿里多么

需要他，但是当阿里吹牛说他需要任不何人帮助时，格拉乔斯既不反感也不过于谦卑。他保持沉默。“这个饥饿的小希腊人，”格拉乔斯友爱的这么称呼他。^①

事情进行得顺利。我能找到该找的人和他们谈话。阿里讲了他的一些令人屏息以听的材料；他记性好，不但记得名字、面孔（特别是有钱人的），而且对于谈话和感情的记忆，对地方的回忆实在使人叫绝。然而他使我迷惑。我记得他的一个最亲密的助手一天晚上在赫琴餐厅说：“他是一架谜语密码的人——机器合成的东西。你按同一个键，但是每次的答案都不同。”“理解阿里的钥匙就是没有钥匙，”格拉乔斯说过。阿里有魅力，他可以极其慷慨；和多数寂寞的人一样，他喜欢和孩子和陌生人在一起，但是他的气质里有一种狂暴性，有时几乎一触即发。我知道他能对人，特别是对他最接近人的，以肆意虐待为乐，可是他又乐意与不幸的下层人站在一边。他的情绪变化无常：时而兴高采烈，时而又会立即陷入深深的绝望，而且不但在喝酒的时候才这样。有一次我提起斯泰夫罗斯·尼亚科斯，他立即就离开了房间，并且把门碰得重重的，我当时相信他不会再同我讲话了。那时我还不知道凡是提到他刻骨仇恨的敌人斯泰夫罗斯·尼亚科斯——他的连襟，而且不久就要同他离了婚的妻子蒂娜结婚——就得非常小心。第二天他好象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一样打电话请我去安娜贝尔吃晚饭，那是他常去的伦敦的夜总会。一九六八年春夏的几个月间，他继续来来去去；我有时接到电话要我去巴黎会他，谈几小时，几分钟，有一次他把

① 这个饥饿的小希腊人什么都能干。——儒文纳

我急匆匆地叫去后，竟没有谈。我在巴黎特雷莫耶旅馆等了两天才回伦敦。他从来没有为此道过歉，也不解释。以这种方式工作了九个月之后，他打电话说这本书先停下，“或者，冻起来：现在不是时候。”他也拒不告诉我为了什么才停，不过他知道我不难从我已知的事情猜出原因来。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日，他和杰奎琳·布维埃·肯尼迪结婚了。

将近六年我再没有看到他或听到他的消息。一九七四年春天他打电话，建议我们到安娜贝尔夜总会去喝一杯。自从一九六八年以后，他生活里变化极大。亚历山大死于飞机失事。蒂娜亡故。克里斯蒂娜结了婚又离了。迈耶从纽约的普·约·克拉克沙龙打电话告诉我，要准备在见到阿里时会大吃一惊。“他也许不是一个儿子所能要求的最好的父亲，但是按他自己的方式他是个慈爱的父亲，”迈耶说。我到达贝克莱广场夜总会时，阿里一个人坐在酒吧前，他的看来很硬其实柔软的手里捧着一大杯黑牌高级威士忌。他竭力想显示出他原来的生命力，但是现在他中心空虚，缺乏希望。他的笑，他说的那些轶事，著名的阿里魅力，曾经在数十年中起过使人欢乐的作用的魔术也好，“妖术也好，现在都已经消失了。他说他“有点不舒服”，其实没什么大不了，“只要休息和娱乐就能恢复”。据说他六十八岁，但是看上去不止，实际上也不止。他点了一支烟，吸了几口，又把它弄灭了，再点了一支。他呷着他的那杯酒。比起我们前次见面时，他把话说到点子上花的时间是长了些。“我们说到哪里了？”他最后以一个老年人的声音问；他又说，他讨厌把事情没办完就放下，这是他对突然恢复谈话的唯一解释。到了秋天，看得出他的日子不会很久了。我猜测他和我谈话不是为

了一本他永远看不到出版的书，他是想找到生活的某种目的，一种可以使他获得自由的解释。他说：“有钱的人也需要有可资依靠的东西。”他仍然絮絮而谈，但是不象以前那么有趣，那么有目的，而是混乱了；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情比新近的变迁在他头脑里更为清楚。一九七四年快结束时我们最后一次会面。凡是他所爱的凡乎已经全都消失了。他已经精疲力尽，连说话都有困难。我们告别的时候他说：“我告诉你，你可有了一个呱呱叫的好故事。”

他说对了。只有一样——这些事需要放在周围环境中，以便看出适当的重要性，在他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五日去世后很长一个时期，坟墓的沉寂使活着的人也封住了嘴，以前曾经得到他准许代他讲话的人也象坟墓一样的无声。我保持着接触，等待着。缓慢地，门一点一点地开了。一九八三年，时辰已到，可以开始讲这个“呱呱叫的好故事”了。

第 一 章

说实在，子肖其父者极少。一般均为不肖子；
有少数则超越其父。

荷马：《奥德赛》

十字架高挂在他的小床上。有时候在地中海黄昏的暮色中，有时候在凌晨的两三点钟，这赎罪的象征似乎浮了起来，离开了墙。黑色的幻影使这个小男孩害怕而又着迷。他确信光线的幻术是上帝启示的谴责——每一桩罪孽，他知道，有施报应的天使；这是他祖母教他的。

自他母亲死后，格瑟塞曼·奥纳西斯既是阿里士多德·索格拉底的祖母又是他母亲。她是个小个子，灰色的头发在脑后梳成又硬又紧的发髻；她强制孩子一定要去教堂，把她卡拉塔斯的家（卡拉塔斯在士麦那沿岸的近郊区）用宗教性的小摆设以及她从朝拜圣地带回来的纪念品装饰起来。这孩子非常爱她，不过她说的有些事使他害怕：他只要稍微不听话，她就警告他，有了罪就要受罚，那怕躲在被子底下，躲到大海中间，躲到最高的山上都没有用。她信仰圣父、圣子和圣灵，信仰天堂、地狱，恶有恶报，永世不得翻身。她祈祷她孙子有朝一日会做个神父，每星期她把的一套内衣送到当地的希腊正教的圣礼拜五教堂去祝福。她孙子在教堂

是祭坛侍者，背得出东正教的圣诗。

阿里士多德出生时，他父亲索格拉底二十八岁，已经踏上成为士麦那最富有的烟草商和企业家的道路。索格拉底是七个孩子中的老二；他是土耳其公民，但有着希腊人的灵魂，而且随着他越来越富有也越来越成为希腊人，尽管他的第一语言是土耳其语。那是一个对安纳多利亚的希腊人走运的年代，他们的企业家的本领和行政管理的才能对奥托曼帝国至关重要，这就给他们挣得了特权与社会地位。土耳其皇帝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陛下——“我们的主和主人，时代的皇冠与万国的骄傲，最伟大的哈里发，宇宙的使徒的继承人，胜利的征服者，上帝在尘世的影子”——一个极为恶毒的人，又名“该咒诅的阿卜杜勒”，容许这些希腊人拥有特殊的财产，但是是有条件的。大部分土耳其市镇都有一个繁荣的希腊人聚居区。区里有自己的医院，教堂，学校与法律制度。但是尽管有着几个世纪的压迫和奴役，安纳多利亚的希腊人从来没有形成一种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变态心理。

索格拉底生于小亚细亚内地一个叫莫塔拉斯基的村子，要不是由于德意志帝国主义，他可能永远不会离开他的出生地。但是德国派出了一批批勘探队、工程师来此设计柏林—巴格达铁路，他们同时带来了惊人的故事，说士麦那那里怎么容易发财。这条铁路是通向英国属地印度的战略跳板。索格拉底和他的弟弟荷马，亚历山大和巴兹尔就动身到那个生意兴隆的城市去了。工程师们的故事没有夸大其词：从士麦那往北、往东的铁路，向西方敞开了奥托曼帝国的巨大的财富。烟草，地毯，棉花，木材，玉米，裸麦，大麦，葡萄干，无花果和煤炭每天每时都大批经过士麦那。索格拉底给家里写

信：“在这个地方再赚不到钱的人，一定是个大笨蛋”。

士麦那是被外国人分割治理的：比利时人控制了水利，地毯，矿产，粮食和干果业；城市的动力是在英国人手里；有轨电车和主要码头则属于法国人；美国人控制了烟草和甘草行业还有石油终端。要闯进这个城市可不容易，但是年轻的索格拉底有青年人的乐观。他，小个子，短头颈，肤色是风吹日晒的浅棕色，黑黑的直头发梳成整齐的分头。他的黑黝黝的厚眼睑下的眼睛与其说透着灵秀，不如说透着精明，他的浓密的涂蜡的军人风度的小胡子掩盖着两张薄嘴唇，女性的嘴。但是他喜欢港口的竞争。“永远不要悲观。悲观是一种病，要象对付疾病那样对付悲观。”这是他经常向他的弟弟宣讲的哲学。

在头两年，他是犹太商人博哈尔·贝纳达瓦的雇员。一旦他攒够了钱，就租赁了阿卜里港的一个小库房，建立了一家进出口商行，经营项目不论，只要能转手赚钱就干。他的货物质量之好是士麦那全市都承认的，他的营业额很快就增长了。他经营的有大项目也有小项目，小的经营项目也一样受到他的注意，不到一年他移居到市中心格兰维齐里一所较大的房子里，又开办了一家库房，位于达拉加士，在近码头的铁路起点站那里。虽然他也放债，做货物保险和搞运输，但基本上是一个烟草商。他的弟弟亚历山大移居到内地去建立联系和搞货源，后来又回到士麦那来，主持达拉加士仓库的工作。

不久士麦那最重要的商人中有了他的顾客；他从帝国奥托曼银行，法国的德意志银行和里昂信贷银行得到各种贷款。那是一个想象力的时代，也是冒险的时代。有一种说法似乎暗示他的经营固然很成功，但是并不十分讲原则：他的

对手们谈起他来，怀着拘谨的尊敬，其中也不乏否定之词——他不记仇，他不食言，他并非有错不改。

随着他们名声的上升，奥纳西斯兄弟开始出入士麦那最高层的家庭；亚历山大和荷马卷入了政治，特别是保卫小亚细亚同盟。这是目的在谋求土耳其内设一块希腊自治区的分离主义运动，以主要是希腊居民聚居地和传统的小亚细亚基督教的中心，士麦那，为国际区。但是索格拉底回避政治；他比他的弟弟更为现实；他集中精力搞生意，他的政治只限于在他认为有用而且安全的同国人组织和民族主义的事业中捐几笔款，签签名。

他回到家乡的村子里，向佩内洛普·多洛格卢求婚，主要是按传统办婚事而不是为了爱情。佩内洛普长得很美，父亲是村里富裕的教会人士。她能读会写与任何男人一样的会算帐，不过她天性头脑简单，严肃，以家庭为中心。两家都高兴，给予新人以祝福；人们都认为他们很般配。在佩内洛普十七岁的生日以前，在士麦那的圣巴拉斯凯维斯教堂举行了婚礼。

索格拉底移居到与士麦那隔河相望的卡拉塔斯，理由是他喜欢乡村，倒不是他天生谨慎。卡拉塔斯建在海边的层层高坡上，聚集着中产阶级的社会集团，有来自世界各地、各民族、各个宗教的商人，阿美尼亚人，希腊人，土耳其人，犹太人，穆斯林，基督教徒都住在一处，几乎是典型的杂居地区。在奥纳西斯的住宅周围几个街区，人们说的语言有十多种。大部分家庭至少说两种语言。

很快奥纳西斯家族全部移居卡拉塔斯：兄弟姐妹。姑姑，叔叔，伯伯，堂兄弟，堂姐妹。虽然索格拉底是次子，却是家里的催化剂，是解决问题和作出大部分决定的人。

在士麦那的婚事十一个月以后，佩内洛普生了第一个孩子，一个女儿，命名为阿尔特米斯，是随希腊狩猎女神取的；两年以后，大概是一九〇〇年一月二十日早晨（不能肯定，因为阿里为了各种原因常常改变他出生的年、月、日）生下了阿里士多德·索格拉底。

随后的六年是索格拉底及其年轻的家庭悄悄致富的年份。他的工作能力还是那么强，但是他越来越离群索居，有着地中海人的特殊的感情上保持超脱的本领。他由于对自己业务专心致志，对阿里士多（家里对阿里士多德的爱称）只表示义不容辞的关心；他从来没有表现出一个希腊父亲和他的独生子间的常有的深刻的和占有性的关系。也许他的冷漠的根子在于他对生意之处的事天生就是那样；但是不管其冷漠的根源何在，阿里士多从很小就深深地感到他们中间的距离。

索格拉底的生意继续在扩展，特别是他的烟草业，虽然在土耳其，这是个不安和危险的时代；在君士坦丁堡发生了流血的叛乱，青年土耳其党人已废除了阿卜杜勒·哈密德皇帝。这个党里很多人是在欧洲受教育的，真正有决心要创立西方民主型的民族主义的土耳其。但是第一次选举调整的结果是几乎把少数民族代表全都取消了，而且不久以后青年土耳其党人颁发了一项不祥的政策，土耳其人治土耳其。

一九〇九年在阿当那屠杀了数以千计的亚美尼亚人之后，基督徒居民中流过一阵恐惧的寒流。但是那一阵子，青年土耳其党人还有比杀尽少数民族更重要的事：意大利进攻了的黎波里，占领了罗兹以及十多个其他的土耳其在爱琴海上的岛屿。土耳其政府为了支付战争，征收了奇重的税。一九一二年土耳其最终签订了奥奇条约，把的黎波里割让给意

大利，条件是意大利必须退出占领的岛屿。但是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门的内高罗而最可怕的是希腊，为意大利的胜利所鼓舞，联合起来反对土耳其。索格拉底与他的弟弟们吵得很凶，特别是同那个性子暴烈的亚历山大，因为他们对希腊本国公开表示同情。他愤怒地叫他们不要忘记一句土耳其俗语：“你若不欲绞索套颈，就要做个刽子手。”

对士麦那希腊人来说，这是个危险的时刻，虽然索格拉底谨慎得来的财富及仔细选择的关系保护了他们，使他们的处境比多数人要好，但是不久他又受到个人生活上的打击。一九一二年，佩纳洛普·奥纳西斯患了肾脏脓肿。开始，还不严重，但是情况突然恶化，非动手术不可。亚力士多感到情况的严重，因为姑姑们悄悄的谈话待到他一出现，她们就停止不谈了；祖母从莫塔拉斯基来到这里主持家务，欧梯米翁神父要求他的教区的教友在祈祷中，把他母亲的名字也列上；他去看望住在士麦那码头后面法国医院的母亲时，修女们对他特别的殷勤。

作了手术几天之后，佩纳洛普的肾功能严重丧失，原先还以为手术很成功，但是她很快去世了。她才活了三十三岁。这样一来，阿里士多就置于深信宗教的格瑟赛曼和一群姑姑的影响之下。他的世界里没有比失去母亲的爱更大的不幸了。

一个健壮的男人需要女人的身体，索格拉底还需要有人来照顾阿尔特米斯和阿里士多。于是在他们母亲死后不到六个月，索格拉底向他的第二个妻子赫伦求婚。他和她结了婚，使她怀了孕。梅罗普出世后，接着又生了一个姑娘卡利卢。阿里士多成为一群妇女的注意中心。他个子小又瘦削，

看上去异常娇弱，人们见了他，总是以为他体弱而有德，很容易爱他。是他的亚历山大叔叔使他没有成为软骨头。亚历山大对这个男孩讲狩猎，航海，性的快乐和危险的亲近，讲世界上的事以及一个男子汉在世上的地位。阿里士多听到的第一句大声骂人的难听话是亚历山大说的，本来他只是在校的院子里听人悄悄地说。亚历山大对他说话不居高临下，不说教，在祖母的宗教色彩浓郁的说教与常常是热心得过份的谈话之后，这实在是一种慰藉。

政治上的积极分子，坚定的爱国者亚历山大是善于辞令的演说家，虽然他的嘴里有时喷出茴香酒的气味；他会说笑话，会淋漓尽至地痛骂，会取笑并总能击中要害。他这么说过，政治是最关紧要的事。阿里士多的头脑善于吸收伟大的，奇妙的思想，而亚历山大则可以源源不断地供应。阿里士多以少年男童的幻想和欲望听亚历山大的故事。亚历山大是家庭里的宠儿，他在侄儿身上培养了魅力的力量也许同时还有力量的魅力。他把一些对他一生有影响的想法和概念注入了侄儿的头脑。关于热情和复仇的观念，忠诚与爱的神秘的希腊的概念，一种祖传的反抗意识，而阿力士多德·奥纳西斯对此从不动摇；而且不管他表面上多么文明，多么见多识广，在他内心的深处有着不能驯服的返祖意识。“你要知道我的仇恨和狂暴，你要在心里明白你侮辱了我，我是必定要报复的。”他可以在五十年后对他的敌人报复，引用西奥格尼斯的话，但是这种精神是亚历山大叔叔的。

阿里士多进了教会学校；他不是个用功的学生，经常是全班分数最低的一个。换了几个学校之后，他转到了士麦那一个规模虽小而学费昂贵的阿罗尼学院。阿里士多在那里表